



做好继承革命文化这篇大文章

□ 李庆刚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独特革命遗存和风貌、革命精神和传统。有学者认为，革命文化可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类：一切与革命斗争有关的、打上了革命烙印的历史遗物、遗存、建筑、旧址和场所，属于革命的物质文化；而在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在内的诸多革命精神，属于革命的非物质文化。

与革命文化相对应，我们还经常听到红色文化的说法，甚至红色文化的说法更为流行。两者是什么关系呢？从目前的文本和语境来分析，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通俗化、形象化表达，多见于口语或一般的宣传报道中；革命文化则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是属于书面化的规范表述。在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付出巨大流血牺牲，革命烈士的鲜血铺就了中国革命的底色。因此，红色是革命文化的表征，而革命是红色文化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红色基因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利用”“发扬”“传承”这三方面要求，归根结底，就是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高度凝练概括的“继承革命文化”。继承革命文化，作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经写入党的十九大新修改的党

章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每一名共产党员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做好的一篇大文章。要做好继承革命文化这篇大文章，必须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中心，与时俱进、返本开新；必须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目标，为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必须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永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本色。

首先，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承革命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个体现、一个寄托”，恰如其分地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各个历史时期价值观不断传

承、演进和发展的精华结晶。而体现“革命先烈理想”的革命文化，则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实现从古代、近代到现代进而到当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一环。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革命文化所崇尚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相通相合，在思想基础和文化根源、价值追求和评判标准上具有一致性、重合性。当我们走进任何一个革命文化遗存，都会感受到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洗礼，潜移默化之中彰显的是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继承革命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与时俱进，返本开新，通过广泛地宣传教育和探索实践，增强革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更好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催人奋进的精神指引。

其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继承革命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革命文化是中

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源泉。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遍访革命圣地，率先垂范继承革命文化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远见十分清晰。他带头总结阐释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要求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他强调弘扬井冈山精神——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他呼吁召唤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他赞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精神可以变物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始终把理想信念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

变精神的辩证法。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干事创业精气神足，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强，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人间奇迹。”历史已经证明，革命文化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法宝，是咨政育人的宝贵精神食粮。未来也必将再次证明，革命文化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最后，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继承革命文化。时代在变，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一直未变。继承革命文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一个重要体现。十九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即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用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郑重态度和坚定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在革命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精神的锻造者、革命文化

的创造者。保持革命精神必须继承革命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的使命和任务。继承革命文化，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需要。“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严峻复杂，任务更加繁重，更需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永葆革命朝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一个丧失或缺乏革命文化根基的政党，是难以彻底进行自我革命的。因此，实现党的革命性锻造，永葆党的革命本色，也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大有校园——我们的精神家园

□ 孙晓亮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45期中青一班一个学期的学习即将结束，就要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美丽的大有校园告别，在冬日的暖阳下回望，带着珍惜和懂得，聆听生命的回声，感受季节的温度，品尝真理的味道，感悟与时代同行的体会。还记得，初入校园，天空澄净高远，秋水无尘，硕果枝头，秋叶轻舞飞扬，落到时光雕刻的脉络里，是对收获季节的礼赞。时光轮回，一时一色，一日一景。离别之际，已是岁寒之时，松柏挺立、银装素裹，留守的天鹅、野鸭栖息湖中冰面，迎接早春的到来。

朝暮晨昏，徜徉在静美的大有校园，浸润在党员领导干部精神殿堂的庄严气质和人文情怀中，踱方步、冷思考。仰望掠燕湖畔两位古代哲贤孔子和老子如山般的伟岸形象，沉思《问道》的深刻内涵。我们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习、问道，问初心使命之道，问治国理政之道，问民族复兴之道。从革命导师《战友》《我们的老校长》《总设计师》前走过，景仰中弄清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真谛，伫立在《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碑前，我们一遍遍地叩问自己的忠诚和担当。鲜红的《旗帜》在风中引路，时刻激励着我们，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历史翻开继往开来的新篇章，我

们有幸与新时代同行，成为新时代的亲历者、建设者。“假此片刻歇息，勿忘万里征程”，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作为。藏秋实而育春华，养精气以待萌发。今天的冷思考，为了明天更好更快的热运行。离开大有校园，我们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从这里出发，我们要在新的起点上，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肩负起历史的责任，不辜负这伟大的新时代！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一班学员，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园风光 谭俊江 / 画

“断屠钓”引发的法治之思

□ 韩春晖

没有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就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法治化，就意味摒弃人治的思维，用法治的方式、法治的手段进行社会治理实践。

“一民之轨，莫若法”。自古至今，中国的历代治理者都重视运用法律的方式来移风易俗，进行社会治理。然而，由于古代法律自身的不科学性和专制体制的局限性，往往有“法”无“治”，反而“法不当必伤善类”，造成不良甚至不堪的社会效果。唐代的“断屠钓”就颇为典型，把封建社会人治化的弊病体现得最为明显。武则天因崇尚佛教而倡导不杀，故而多次颁布“断屠钓”的敕令来移风易俗，禁止所有官员百姓屠杀牛羊和钓鱼。所谓敕令，是唐律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唐律的主要形式包括律、令、格、式、敕令、习俗、比附等，其中律、令、格、式属于第一层次，敕令、习俗、比附等都是律、令、格、式的补充形式，但敕令由于来源于皇帝，故而其效力甚至超过律、令、格、式，因此对敕令的执

行非常严厉。“断屠钓”的敕令推行两年之后，官民皆顾忌禁令，表面上敕令得到了圆满的执行。而此时发生了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有一朝廷命官姜世德奉使巡陕陕西，地方官员招待时上了一盘羊肉。姜世德假装生气地问：“不是颁布了‘断屠钓’吗？怎么会有羊肉？”厨师非常机智地回答：“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狼咬死的。”姜世德不禁感慨：“豺狼可真懂事呀！”不一会儿，厨师又上来一盘鱼片。他又问：“怎么会有鱼？”厨师又答：“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狼咬死的。”听闻此言，姜世德想：豺狼也不大可能到水里去咬鱼，不由骂道：“蠢货！怎不说是水獭咬的！”事实上在当时，无论朝野，无不作弊在蔬菜中藏肉，由此出现种种荒诞场景。

个中缘由，大体有三：其一，该敕令乃武氏个人意志体现，在“朕即天下”的君主专制体制下缺乏民主意志，实为“人治化”治理；其二，该敕令确定的道德标准过高，在“宗法制”为主导的治理结构中缺乏社会基础，实为“道德化”治理；其三，该敕令倡导的“不杀生”目标源自佛教要义，在当

时日常生活食物都不足的情形下缺乏客观条件，实为“宗教化”治理。因此，有此三弊病存在，此项法律必然违背了社情民意，逼迫老百姓阳奉阴违，而“不得善终”。

古人云：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大国治理，礼法正则民志定。这些说法考虑到了法律规范的刚性特征，要求以律治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基本上还属于在人治框架下的法制思维。而进入现代社会后，只有法律，而法治缺席，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就无从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既反对“人治化”，又反对“道德化”，更反对“宗教化”，本质上要求的是以人为本、规范和服务于人的“良法之治”，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最美校园”征稿启事

亲爱的读者：

本版将开设“最美校园”专栏，征集摄影、绘画、雕刻等反映校园景观主题的作品，以及反映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人文历史的诗歌、散文、随笔类作品。不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请您拿起手中的（画）笔、相机，把自己心中最美的校园风光展示出来，与读者朋友共同分享吧。